

# 进化论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

——从日本明治文坛的影响谈起——

寇 振 锋

## 1 序言

因戊戌政变而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于四年后的1902年11月在自己创办的小说杂志《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为中国首次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有研究者认为，“小说界革命”的提出是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影响<sup>1</sup>。其实，“小说界革命”是在梁启超居留日本四年后才提出来的。因此，“小说界革命”与当时日本的进化论思想以及明治文坛之间应该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但迄今为止，有关梁启超的文学上的进化论与明治文坛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sup>2</sup>，特别是专门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考察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与明治文坛之间关系的文章还未见到。

那么梁启超进化论的观点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与他所居留的日本有何关联？“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又与他所标榜的进化论有何联系？另外，“小说界革命”又与明治日本的进化论大背景下的“小说改良”“小说革新”以及田口卯吉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呢？本文将就此类问题予以探讨，找出其中的某些关联因素，同时也为进一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坛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 2 日本进化论学说对梁启超的影响

在日本，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名著《物种起源》是1877年由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西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最早介绍到日本的。他于1877年至1879年的两年间，在东京大学讲授动物学，其间广泛介绍进化论学说。后来石川千代松于1883年将他的系列讲稿编辑成《动物进化论》。不过，在当时的日本，生物学领域内的进化论影响较小，相反，在思想方面所起到

的作用是巨大的<sup>3</sup>。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扩展到社会和国家间的竞争。于是在日本开始将“富国强兵”正当化，作为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吸收。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1882）最具代表性，他攻击自由民权思想，认为人种、国家有优劣，国民中也有优者和劣者，他反对普通选举<sup>4</sup>。

在中国，进化论是在甲戌战争以后才传入进来的。中国引入的进化论并非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著述，而是英国生物学者、哲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和伦理学》（1893），赫胥黎是达尔文最忠实的追随者，是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猛犬”式的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得以迅速流传，有一半的功绩应归于赫胥黎。严复将该书译为《天演论》。《天演论》于1896年译完，1897年登载在天津的《国闻报》上，1898年2月正式出版了单行本。《天演论》刊行的目的在于警告清政府，警告人们在瓜分之祸来临之际，全国上下只有奋起抗争，才能适应“物竞天择”这一进化的规律，否则，可能要遭亡国灭种之祸。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从严复那里借过译后的草稿来读<sup>5</sup>。梁启超对《天演论》极其感兴趣，该书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天演论》的进化思想和《仁学》的破坏性批判成了梁启超急进的民权主张的双翼。”<sup>6</sup>可见在梁启超亡日之前，进化论的思想对他已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进化论对梁启超产生的绝对影响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政变以后。”<sup>7</sup>换言之，梁启超是在明治日本的进化思想的影响下其思想上才发生这种决定性变化的。

从时间上看，日本进化论的输入要比中国早整整二十年。而且，在日本，文学家与进化论也是息息相关的。二叶亭四迷曾读过英文版的《物种起源》<sup>8</sup>。而且外山正一、天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共著的《新体诗抄》（1882）以及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1885-1886）等文学改良运动中的名著都曾与进化论热有密切关系。

坪内逍遙的思想接近于主张稳健地改良社会的改进党的思想，又都与进化论有密不可分。他把精神、历史、社会等现象当作进化的过程来理解，其中《小说神髓》就明显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经过这样的进化，小说就自然地来到了世上，亦自然受到尊重。此为优胜劣败，自然淘汰使然。”<sup>9</sup>坪内逍遙将这种文学类型的盛衰及交替看作进化的过程，充分认识到描写人情世态的小说这一类型所处的优势地位。

就梁启超而言，在《清议报》时期，日本的进化论就已经深深地渗入到梁启超的脑中<sup>10</sup>。由梁启超亲手翻译的并连载于《清议报》之上的柴四朗所著的《佳人奇遇》中就曾多次出现“优胜劣败”字样。对此，梁启超都忠实地进行了翻译。在1901年《清议报》第100册所载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

历》一文中，梁启超总结概括了《清议报》的特色时明确指出：“内其国而外诸邦，一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痴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sup>11</sup>利用进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主张开民智、振民气。而且梁启超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用语就是当时日语中普遍被使用的词语<sup>12</sup>。而且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所受日本影响的事实，他早在1899年10月的第30册《清议报》上所载的《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一文中就指出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两句话的由来，“此二语群学之通语，严侯官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译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今合两者并用之，即欲定以为名词焉。”<sup>13</sup>由此可见，日本进化论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新民丛报》期间，梁启超利用进化思想所展开的论述更是有增无减。如第1、3、14、16、20号上的《新史学》（1902）、第2号上的《新民说·就优胜劣败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1902）、第2至第5号上连载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第8、23号上的传记《张博望班定远合传》（1902）、第8、9、17、49号上连载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1904）、第18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1902）、第10和11号上的《新民说·论进步》（1902）、第22号上的《释革》（1902）等等，都曾广泛地融进了进化论思想。

据先行研究得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以及《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等文章中的进化论观点就是受到天野为之的《万国历史》和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的影响<sup>14</sup>。另外，题目上就含有“进化”一词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的开篇就有如下论述：“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sup>15</sup>这里所指的“天地古今之万物”，小说显然也是包含其中的。

梁启超不但在思想方面运用进化论原理发表了一系列振奋国人的新的论说，在文学领域同样没有忘记进化论的理论。梁启超是在抵达日本四年后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在中国首次发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那惊天动地般的呐喊。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梁启超的贡献，并不在于单言‘进化’，而是将这‘进化’之理引向民族痼疾之根本处，并由此而倡言文学革命。”<sup>16</sup>这文学革命显然就是梁启超在日本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其中影响最大且成就最显著的莫若“小说界革命”。这“小说界革命”又与明治日本的“小说改良”与“小说革新”极其相似，甚至有着密不可分的姻缘关系。

### 3 明治文坛上的“小说改良”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

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撰写了《劝学篇》(1872-1876),并在杂志上发表演说,主张“文学”无用论,认为与其作诗不如种田,风流的学问是不可取的。当然他指的“文学”并非一般的文学,而是指时代文学,即戏作文学,是那些旧的劝善惩恶主义的文学,是不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文学。中村敬宇更是极端的文学有害论的倡导者,他在《西国立志篇》(1871)中极力功击戏作文学。两人都对戏作文学给予了严厉批判,主张改良戏作文学,使其成为真正有用的文学。这就是明治日本最早提出的文学改良论。不过,在日本最早将“改良”一词与文学革新相结合的是服部抚松在1876年的《广益问答新闻》上登载的“小说稗史有益于世也有害于世,虽应禁止过去小说稗史中的淫褻,若改良之如何?”<sup>17</sup>由于文章只是提问而没有回答,还不能算作确切的小说改良论。但是,随着西洋文化的引进以及进化论的广泛传播<sup>18</sup>,以西洋文学乃至小说为标准的改良意识逐渐增强。

最早的小说改良论《我国播殖自由种子之一手段在于稗史戏曲等类的改良》出现于1883年6月的《日本立宪政党新闻》上。该文章被认为是明治时期小说改良的代表作,又是一篇著名的政治小说理论文章。关于《我国播殖自由种子之一手段在于稗史戏曲等类的改良》这篇文章的作者,中村忠行认为是与晚清亡命日本的改良派等人物有过密切接触的山本宪,中村的理由是当时山本宪是《日本立宪政党新闻》的记者<sup>19</sup>。

山本宪,又名山本梅崖,与梁启超的关系非常要好。早在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时俩人就已经结识<sup>20</sup>。山本还向第61册的《时务报》上投了一篇题为《朝鲜辞俄国陆军教习及度支部顾问官本末》(1898)的文章,而且康梁等来日后又亲自登门拜访,并支持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清议报》第2、5册上就载有他的《论东亚事宜》(1899)一文。这表明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他对梁启超办报的协助与支持。先行研究还认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是受山本这篇文章的影响的可能性很大,梁启超还很有可能读过山本的文章或听其说过此篇文章的主旨<sup>21</sup>。从两人之间的关系来看,笔者对此持相同的观点。下面我们再从进化的角度去发现两者间的雷同点。

《我国播殖自由种子之一手段在于稗史戏曲等类的改良》中在肯定了小说戏曲等类对妇女儿童及下等人的感化力之大的同时,认为过去旧小说的主旨是:

抑在我国俗间广泛流行的稗史戏曲等类所感化诱导妇女儿童及下等者流之力最大,可以说稗史戏曲等类是俗人的具有出色学问的教师,可是我国过去的

稗史戏曲等类皆只写专制之历史，故其主旨所在概非忠孝节义，则为优胜劣败之战记，非眷眷之恋情，则为盗贼赌徒，非怪说鬼谈，则为滑稽谐谑。

文中还列举出此类小说的恶劣影响：

总之，若是专制统治下所表现出的所谓人情风俗等之写照，在吾辈迎逢开明之风气的今日，与其说是利益部分甚少，毋宁说其给予的伤害部分居多。

于是，要想使下层人能够“启其蒙，破其陋的伟功奏效”，“今日确宜迎来改良此稗史戏曲等类之气运。”文中充满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所感染的印迹。《我国播植自由种子之一手段在于稗史戏曲等类的改良》的主旨在于要将小说作为启蒙的手段，作为社会进步的要求而进行改良，期待出现新的作家，期待改良作品的内容。总之，旧的小说戏曲等类多表现为“所谓的人情风俗”，现今如果要想“迎逢开明之风气”，就会发现其“利益部分甚少”，相反所带来的“伤害部分居多”。也就是说，过去的小说戏曲等类“皆捏造产生于其专制弊习之中，故其在感觉上会养成污染陋习，拘泥于旧习之弊。”因此，如果不改良那些小说戏曲等类，“终将成为无用之长物，为社会所废弃，即只成为将害恶流传于社会之一种器具。”<sup>22</sup>小说是把“活泼自由之气力”贯彻到下层社会的媒介，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改良小说。

这篇小说改良论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都是在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来分析小说改良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旧小说的弊害在于：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来自何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来自何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来自何乎？小说也。……。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

梁启超最后同样指出，要改变这些坏思想必须进行“小说界革命”。“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总之，“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明治时期小说改良的代表作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两者都是基于进化论的观点，又都认识到改良小说的重要性，都期待具有高尚思想的政治小说的出现，在现实的形势下，必须进行小说改良，最终才能使其成为播植自由以及新民的最好手段。

另外，在《我国播植自由种子之一手段在于稗史戏曲等类的改良》发表的同一年，还有赤羽万次郎发表在《东京舆论新志》上的演说《论稗史讲谈演剧的改良》。演说中论及到了小说戏剧的改良。1884年的《东京日日新闻》上登载了末松谦澄的《歌乐论》，文中主要论述了诗歌改良。同年的《读卖新闻》上还有署名龙泉居士的《俗曲改良》以及银西野史的小说家的改良论《小说作者》。同年的《朝野新

闻》上还有《论小说的精神》。这些小说改良论，都是认为日本原有的文学及小说已经陈旧，必须进行改良，主张改良为西洋式的欧化思想。

其次，梁启超曾经盛赞的政治家兼政治小说家的矢野龙溪和末广铁肠也都曾发表了著名的小说改良理论文章。矢野龙溪于《经国美谈》刊行三年后，在《邮便报知新闻》上分两次连载了《小说论》<sup>23</sup>一文，文中指出：

年少之男女爱读稗史小说的理由中，最大者为未经世故一事也。……然导年少之男女走向严正之道路者亦小说，且使其陷入品行不端者亦小说。是先有淫靡浮薄之风俗，而后产生淫猥之小说？还是先有淫猥之小说，而后有产生淫靡浮薄之风俗？吾虽不得而知，然有其因必有其果一事，盖为无争之事实。淫靡浮薄之风俗得淫猥之书，则愈益增长其浮薄之恶，淫猥之书遇浮薄之风俗，则愈益增加其数量。

矢野龙溪认识到了小说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大的同时，对旧小说的否定，实际也就是主张改良小说，这篇小说改良论同样是从正反两个角度来论述的，这与梁启超的论述同样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末广铁肠在1886年发行《雪中梅》的同一年里，他还在当时的大报《朝野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改良论<sup>24</sup>。其中《小说改良》一文较为突出。文中指出：

夫小说，今日之状况，全为封建政治之残余，似乎不易开启改良之端绪，叹息至极。尤其近来学者政治家等亲身努力从事小说创作，然未出多少贵重之著作，非但如此，看假名新闻上登载之小说，千篇一律非但毫无变化之妙，且其趣工之处，非小男小女投身道行，则盗贼赌徒等之状态。概言之，不出淫猥和残酷二者。

作者接着指出，要象改良戏剧一样改良小说，只有改良才可以说“小说之一大进步”。作为政治家兼小说家的末广铁肠，他能提出一系列的小说改良论，并且登载在当时的大报上，在当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一小说改良论也又与梁启超的小说改良论相似。虽然梁启超是否借鉴了矢野龙溪和末广铁肠的小说论，不得而知，但表明这类文章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倾向。

而且，其他大家也都曾对小说改良进行过论述。1887年《邮便报知新闻》上所载的未署名的《小说论》也是一篇重要的小说改良论。文章的主旨是要改良小说，使其适应文明社会，那些淫猥、下流、过于残酷的必须排斥。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柳田泉认为一定是个大人物，或是矢野龙溪或是尾崎行雄<sup>25</sup>。同年，翻译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政治小说《春莺啭》的译者关直彦在《东

京日日新闻》上发表了《日本小说改良论》，主张反对将旧式的劝善惩恶小说作为小说的主眼，一定要注意勿使小说走向卑猥和残酷，并认为小说改良是个大事业。另外，1888年佐佐木弘纲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的《长歌改良论》。类似的小说及文学改良论不胜枚举。而且这类论述在当时上述的大报上频频出现。在进化论的感染下，著名的大家在人所共知的大报上发表小说改良论，不可否认，这些改良与进化的观点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深透到梁启超的脑中。

综上所述，在进化论思想日益高涨的影响下，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文坛上的进化热也毫不示弱。“文学改良”、“小说改良”在八十年代前后呼声不断。这段期间呈现出的“小说改良”热主要是向劝善惩恶小说的挑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主张向政治小说靠拢。这也成了当时文坛上的一大潮流，对于以政治宣传为中心的梁启超来说不是正合其胃口吗？可以说，明治日本的“小说改良”本身就是一种进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奠定了文学进化论观念上的理论基础。

#### 4 明治文坛上的“小说革新”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

在梁启超抵达日本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及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小说界的进化，“小说改良”的呼声已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小说革新”的主张。较早使用“小说革新”一词的是高山樗牛在1887年6月的《太阳》第3卷第12号的《明治的小说》一篇长文上。稍后柳井録太郎在1898年4月《太阳》增刊《莫都三十年》上所写的《第九编 文学》中的小说部分也是在高山的基础上撰写的，文章中同样出现了“小说革新”的字样。而且梁启超在1899年9月的《清议报》第26册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中的一大段关于日本政治小说的论述就是直接来源于柳井在《莫都三十年》上所写的《第九编 文学》中的小说部分<sup>26</sup>。也就是说，梁启超一定读过的柳井的“小说”部分。当然文中的“小说革新”一词梁启超也一定见过。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梁启超在他的文章中却没有如实地反映出这一词语。然而，三年后的梁启超却大胆地抛出了远远超过“革新”一词含义的“革命”这一重磅。

关于“小说革新”，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也是高山樗牛1898年4月在《太阳》第4卷第7号上发表的《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非国民的小说》一文。下面我们看一下这篇高呼“小说革新”的文章与“小说界革命”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间的一些相似点。

首先，表现在注重国民性上。《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非国民的小说》中的“非国民的小说”是指那些完全独立起来并与真实的社会截然分开的写实小说。也就是说要通过“革新”使小说与实际生活密切相涉，使其描写“国民性”。高山所指的“国民性”被认为与教育救语的德目是一致的<sup>27</sup>。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论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高山在文章中认为，“明治二十年以后的小说在进步的同时，渐渐远离国民性情，这就是导致今天这样极衰的原因。而这极衰的萌芽实际是由逍遥的《小说神髓》一书所包藏着了。”也就是说，小说进化到1898年前后，小说界呈现出了“极衰”的状况。于是他认为，作为理想的小说榜样恰是梁启超所称颂的《经国美谈》《雪中梅》《花间莺》那些政治小说。文章还指出：

日本国民是快活乐天之国民，然写实小说却述说悲哀厌世之恨事。日本是尚武任侠之国民，然写实小说讲述涕泪柔儒之事迹。日本国民是最富有道义情绪之国民，然写实小说却对彼等褒奖非伦败德。日本国民以忠孝义勇为人道之大本，然写实小说却不言君父。日本国民重家系继承关心国家命运为世界无比，彼等将视为君父死是最高之名誉，确信国民的利福惟在国家昌荣中见得，然写实小说却为其说情死、说明权、说平等，对于花柳之情恨、市井之屠沾，写实小说却往往描写得极其巧妙，然探求国民意识之底蕴，其性情若终了之弦有几何？故此作家之技巧愈精湛国民去之愈远。

高山从以上五点论述了必须“革新”小说的理由，呼吁“革新”当时文坛上写小说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认为是写实小说将国民的思想带坏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也有极其类似的观点。

今我国民，惑湛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卑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缱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



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梁启超也同样从以上五个方面指出了必须在小说界进行“革命”的原由。国民身上所存在的种种弊端都是“惟小说之故”，是小说将善良的国民带进了深渊。综上所述，两篇文章不仅在表面上酷似，就连展开论述的方式也很雷同，甚至内容都有很多相似点。因此，从对国民性所进行的分析这一根由来看，两者之间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吧。

另外，高山的这篇“小说革新”的主张又与同年稍后的一系列政治小说期待论相吻合。如《帝国文学》上匿名的《政治小说的机运》(1898)，《大日本》上内田鲁彦的《作政治小说》(1898)，《新小说》上后藤宙外的《小说界的新生面》和《再论政治小说》(1898)。因此，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同一年所高唱的国民小说的政治小说论正好赶上了这一潮流<sup>28</sup>。那么，换言之，梁启超受到这种“小说革新”的影响也是很可能存在的。不久，文坛上展开了以《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非国民的小说》为由的论争，比如《读卖新闻》上所载的户川秋骨的《非国民的小说为何物？》(1898)和《早稻田文学》上的纲岛梁川的《国民性和文学》(1898)等，这些关于小说与国民性的论争是当时“小说革新”的重要体现。这些论述对梁启超有关“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的小说新民观可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其次，表现在对读者的全面肯定上。以国民性情为第一要义的高山主张将大量读者纳入进来，确立了新的批评意识，那就是要找准评价读者嗜好的评价轴，也就是说“小说革新”的目标是“建立新的解释共同体”<sup>29</sup>。高山在此文章中，将读者统一为国民，而且对读者持全面的肯定态度，否定的只是写实主义小说。这与梁启超所主张的“小说界革命”也极其相似。梁启超虽然认识到中国国民性上的一系列坏思想，但他却认为原因是小说在作怪，他否定的同样只是那些给国民带来坏影响的小说。

最后，表现在小说的自律性上。高山的文章中充分体现了重新意识到读者嗜好的文学自律性<sup>30</sup>这一问题。以此为前提的“小说革新”又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审美心理的论述以及对小说艺术感染力的评价极其相似。

下面我们看一下梁启超可能受过高山犒牛文章影响的可能性。高山是1897年4月至1902年12月《太阳》杂志的主笔，这段时期被称为“《太阳》的黄金时代”<sup>31</sup>。经笔者考证，《清议报》、《新民丛报》与当时日本最大的杂志《太阳》为互赠刊物。而且，杂志之间的文章还相互转载，国内的《时务报》以及《清议报》和《新民丛

报》上明确标明译自《太阳》的文章分别为五篇、十篇和三篇，又如《太阳》第5卷第20号（1899年9月）上还原文登载了梁启超的《论文那与欧洲国体异同》，另外，《太阳》第4卷第21号和22号上还分别刊登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两人合影及康有为的单独照片。而且《新民丛报》还模仿了《太阳》，因此梁启超与《太阳》的关系极为密切<sup>32</sup>。

梁启超早在与《太阳》编辑人岸上操笔谈时就曾谈到高山<sup>33</sup>，这也表明他对高山已经早就关注了。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盛赞的《莫都三十年》（1898）和《十九世纪》（1900）就是高山任主笔的《太阳》“黄金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增刊。梁启超还在《东籍月旦》中曾高度评价井上哲次郎与高山合编的《新编伦理教科书》时指出：“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书亦精心结撰。”<sup>34</sup>另外，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还肯定了高山所著的《世界文明史》（1898）一书，而且根据该书的序言可知高山还将撰写《十九世纪文明》一书，对此梁启超写道：“自序言别有十九世纪文明一书，数月之后便当杀青。然至今已三年有余，尚未出版，良可惜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高山的一则序言中所提到的书籍竟然期待了三年之久，那么，梁启超对高山的著述是何等的期待已是可想而知了。虽然高山的文章是载于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前的1898年4月的《太阳》上，但从梁启超看过1898年4月刊行的《太阳》增刊《莫都三十年》来推测，梁启超一定也收集了他到达日本之前的一些过期的《太阳》。因此，综上所述，梁启超看过高山《小说革新的时机：责难非国民的小说》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影响的成分可能是可能存在的。

其实，当时的日本不仅在小说领域出现了“革新”，而且在和歌领域也出现了“革新”。比如1898年3月《国学院杂志》上所载的《短歌革新的时机》，第二年《读卖新闻》上的《关于和歌坛的革新》《再关于和歌坛的革新》，还有正冈子规的《短歌革新论》等等。自梁启超抵达日本前一年的1897年后，曾出现许多带有“革新”字样的论著及杂志。如《森林制度革新论》（1897）、《真宗大谷派革新事情》（1898）、《理科教授革新之着想》（1899）、《僧风革新论》（1899）、《仙台革新论》（1900）、《议会革新论》（1902）、《教育革新论》（1903）等论著。另外，在1901年还出现了《革新天气预报》杂志，1902年1月还发行了《革新》杂志。

由此可见，在梁启超抵达日本之后，有关“革新”的字眼频频出现。但梁启超却未使用“小说革新”一词，对梁启超来说，显然这个词语的力度不够。但从“小说改良”到“小说革新”的进化过程梁启超一定有所认识和了解。两者都是要摆脱原有小说的旧习气，都是小说进化中的一个环节，从这一点来看，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两者出现的背景又有所不同。“小说改良”是在政治热的背景下发起的，

与政治息息相关。总之是政治运动带来了小说改良<sup>35</sup>。而“小说革新”是在“小说改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开始重视读者的嗜好以及小说的自律性。梁启超在感知日本小说界从“小说改良”到“小说革新”所经历的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之后，他无疑感到这一进化的路途是漫长的，于是，他在中国喊出了更为震撼的口号“小说界革命”。就是要彻底清除一切旧的因素，使小说快速走上进化的正轨。

## 5 田口卯吉的文学改良论的影响

明治时期的文明史家、经济学家田口卯吉著有《日本开化小史》(1877-1882)、《日本开化之性质》(1885)、《日本之意匠及情交》(1886)、《支那开化小史》(1883-1888)<sup>36</sup>等。田口卯吉，号鼎轩，是明治文学改良的重要人物。如下稍后将要论述的一样，文学研究家柳田泉和吉田精一都对田口卯吉的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柳田泉指出，“开化史”时期的田口卯吉的根本思想就是人类进化的原理<sup>37</sup>。前面已经提到，竹内弘行曾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等文章就受到《日本开化小史》中田口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笔者下面从文学和小说的角度加以探讨。

像田口卯吉那样的当代名士都论及文学改良，东京大学文学士坪内逍遥也论及文学改良并写小说，甚至有人认为小说已成了当时绅士淑女社交上所必须的。这些事实都是改良文学、提高文学地位的重要因素。柳田泉把田口卯吉与坪内逍遥的文学改良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逍遥是从内部予以革新，鼎轩是从外部的改良，都是作为社会改良一大动作而进行的。”<sup>38</sup>二人的配合无疑为小说乃至文学的进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吉田精一根据《日本开化小史》肯定了田口在启蒙期作为广义上文学改良论者所应有的位置。他的文学论首先表现在《日本开化小史》之中。吉田认为田口是“最早发表日本文化改良评论的先达之一。”<sup>39</sup>

田口在《日本开化小史》的第7章指出，“所谓文学即人心之显像”，文学又是“货物”之一，认为人心的进步与货物的进步应该并驾齐驱。他在第12章“文学进步的景况”一节论述到德川时代的文学时，仍然强调“应该认识到文学的进步是与财货并行。”田口在《日本开化小史》中关于文学改良与进化的论述，梁启超是应该见过的。之所以可以这样说，原因在于梁启超看过《日本开化小史》这部书，因为《新史学》就曾受其影响，而且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第11号的《东籍月旦》中曾向国人努力推荐田口著的《日本开化小史》和《支那开化小史》。梁启超对《日本开化小史》是这样概括的：“与《支那开化小史》同出一人之手，其议论常多独

到处。虽我邦人读之，亦不至生厌，若欲略知日本数千年进化之迹，毋宁此书为良。”<sup>40</sup>从这几句简短介绍中可知梁启超看过此书，并且他也同样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日本的神道佛法、汉学、政府、社会、文学起源、文学沿革、战乱等，通过这些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日本文明开化的历史。书中对日本文坛上的文学改良、小说进化以及文体进化等都进行了论述，对此，梁启超也决不会视而不见的。

可以说，在1885年前后的一段时期的日本，整个国家都陷入改良的大潮之中。各种改良论调此起彼伏，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教育到思想、宗教、语言、学问、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在改良。从衣食住到发型、舞蹈、唱歌、基督教、罗马字、添假名、文章、诗歌、谣曲、小说、演剧、铁道、尺度等等，或发起改良会，或组织改良运动，或倡导改良论，恰似当时人们所夸口称赞的“改良之世纪”<sup>41</sup>。

在这种大环境的渲染下，带有“改良”字样的改良文学论不断出现。这与上面谈到的“小说改良”热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因此，不仅《新史学》上的进化论思想是受到了田口卯吉的影响，而且对于文学及小说领域的“沿革”以及“进化”，对依靠小说救国的梁启超来说是不会忽视的，非但如此，对他的启发也就可以想象的。

## 6 梁启超将进化论融入小说理论和小说作品之中

文学的传承有一个进化与淘汰的过程。在日本的影响下，梁启超从进化的角度在理论上为中国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并且在他身上也充分体现出了进化的轨迹。《清议报》创刊号上的小说理论《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所表现的初期小说理论完全是以功利性为核心的，但到了《新小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时，小说的功利性明显减弱，相反，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开始得到重视，已经由政治宣传为中心转移到兼顾读者审美的心理分析，梁启超通过“熏”“浸”“刺”“提”的小说四力，分析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原因之所在。并在文章的结尾处为中国小说界喊出了史上未曾有过的“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这无疑得益于他站在了小说进化的制高点上。

在“小说界革命”提出十个月之后，梁启超在文学领域的进化论思想更加完善了，他开始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论述进化。在1903年9月的《新小说》第7号上的《小说丛话》里，梁启超针对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代中国文学的进化轨迹，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

表现出了他的中国文学的进化论观。首先，在小说语言、文体上指出了进化这一真理：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

其次，他还针对韩愈的观点提出了小说体裁上的进化观：

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愈简单，愈高等者则愈复杂，此公例也。

梁启超的此两种小说进化观，均出自《新小说》杂志第7号上《小说丛话》中的首篇。“小说丛话”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多人集体创作，在展开的议论中，已经基本脱离了初期的政治功利主义，并开始逐步从小说自身的立场上来着眼，阐述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和批评。其实，这种在中国小说领域首先开河的“小说丛话”的论述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进化的极好表现，这一功绩离不开梁启超的首倡。

并且梁启超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对进化论观念同样表现得极其明显。《新民丛报》第1号所载的传奇小说《劫灰梦传奇》中就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了小说之中：“优胜劣败，竟立争存。斯事畴怜惜，百年龙战欧和亚，梦觉黄粱日已斜，英雄泪，向谁洒。”小说中还紧接着指出：“自古道，物耻可以振之，国耻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国自今以后，上下一心，发愤为强，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呢。”<sup>42</sup>显然是用进化论的观点来呼吁全国人上下一心，奋发图强，是可以将我国挽救欲于危难之中的。

梁启超还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3回的黄克强、李去病二人的大辩论中同样融入了进化论：“我看古今万国革新的事业，一定经过许多次冲突，才能做成。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sup>43</sup>

梁启超不仅在政论文上运用进化论思想，在小说理论及小说作品中仍不忘宣传他那进化论思想。这对热衷于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和酷爱其所创办的杂志的读者来说不能不受其进化思想的感染吧。

## 7 结语

亡日后的梁启超不仅从思想的角度来论述进化，而且在文学领域广泛运用进化

论原理。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提出离不开进化论的影响，并且梁启超的小说进化观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日本明治文坛的影响与渗透。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在明治日本进化论热的大环境的影响下，亡命日本后的梁启超感知到了文学乃至小说领域的进化，充分了解到明治文坛上的“小说改良”和耳闻目睹的“小说革新”的热潮，并且一定感受到了进化论者田口卯吉的文学乃至小说上的进化思想。在明治文坛耳濡目染的四年后的梁启超终于在中国的小说界第一次提出了远远超过“改良”“革新”之意的“革命”一词。“革命”这一声呐喊无疑是在梁启超考察日本小说界的从“改良”到“革新”所经历的漫长之路后所作出的决断。

其次，正如日本政治小说家一样，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走上了小说界的进化之顶峰，而且他还亲身试作小说，并创办中国第一个小说杂志《新小说》。作为政治家的他所采取的这些超乎寻常的行动，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小说界进化路径上的一束闪耀的亮点。

再次，在文学的进化中，小说是核心，小说的进化无疑走在了进化轨道的前面。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提出的“小说为文学最上乘”以及站在文学自律的视点上对读者的审美心理所进行的分析，这都是中国小说进化征途上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在明治文坛的熏染下，梁启超为中国小说界更快更准确地找到了进化的方向和路径。

最后，从明治小说界的“小说改良”到高山樗牛所倡导的“小说革新”，再到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这都是进化轨迹上的一连串的一环。并且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已经囊括了明治文坛上的“小说改良”“小说革新”这两个方面，是在此基础上的总结和发挥，“小说界革命”无疑是梁启超所标榜的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而且1917年的“文学革命”就被认为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翻版<sup>44</sup>。可见，“小说界革命”对后来中国文坛的所波及的影响是深远的。

总之，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观点就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其中又与日本明治文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注

1 方正耀认为，“梁启超吸取了严复、夏曾佑、康有为的观点，进而提出小说界革命。”参见《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p. 226。

2 斋藤希史《汉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2月，p. 77-84, 90-95.）中从进化的论述过梁启超的文学及小说，但未言及与日本的关系。谢飘云的《进

- 化论与梁启超文学变革设计的新思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庄桂成的《进化论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6卷第4期2007年8月)这两篇文章也论述到了进化论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关系,但就有关日本影响的论述只是一带而过。
- 3 渡边正雄《明治初期のダーウィニズム》,《西洋の衝撃と日本》讲座比较文学史之五,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10月,p.90。
  - 4 参见植手通有責任編集《西周;加藤弘之》中央公论社1972年1月。
  - 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p.57。
  - 6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增补版,みすず書房1969年1月,p.258。
  - 7 同上注p.260。
  - 8 中村光夫《日本の近代文学と文学者(21):進化論の影響》,《朝日ジャーナル》,1977年2月。
  - 9 坪内逍遥《小说神髓》《逍遥選集》所收(别册第三),第一书房1977年11月,p.41。
  - 10 如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9册上发表的《论支那宗教改革》和《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年6月28日),第22册上的《爱国论·论民权》(1899年7月28日),第30册上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和《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1899年10月15日)等文章中都运用到了进化论思想。另外,《清议报》还从第47册(1900年6月7日)至第70册(1901年2月19日)分十一次断续连载过日本进化论论者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虽未连载完,但在1903年由广智书局刊行了单行本。另外,本稿所使用的《清议报》的版本为中华书局1991年的影印版。
  - 11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 12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p.276。
  - 13 梁启超《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
  - 14 竹内弘行《中国的儒教的近代化论》研文出版1995年9月,p.177-180。
  - 15 《新民丛报》第8号1902年5月。本稿所使用的《新民丛报》的版本为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的影印版。
  - 16 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史哲》,2000年第2期。
  - 17 《广益问答新闻》1876年6月。参见柳田泉《明治初期の文学思想》下卷,春秋社1965年7月,p.274。
  - 18 据渡边正雄、尾世蓉子的调查可知,在当时的杂志上所裁的有关进化论文章所占的比率非常高,而且在杂志中所占的位置也极其重要的。参见《明治初期の学術雑誌と進化論》《科学史研究》通卷88号,1968年12月。
  - 19 中村忠行《中国文芸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芸の影響》(四),《台大文学》第8卷第4号,1944年6月。
  - 20 中村忠行《中国文芸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芸の影響》(三),《台大文学》第8卷第2号,1943年8月。
  - 21 中村忠行《中国文芸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芸の影響》(四)。
  - 22 《我国ニ自由ノ種子ヲ播殖スル一手段ハ稗史戯曲等ノ類ヲ改良スルニ在リ》《日本立宪政党新闻》1883年6月29日。
  - 23 《邮便报知新闻》第4397号,1887年9月27日。

- 24 如1886年5月发表的《人殺シノ流行》、《実ノ詮議》、《勸善懲惡》，9月发表的《雪中梅批評ノ諸君ニ謝ス》，10月发表的《小説改良》，以及第2年2月发表的《落葉ノほき》等。
- 25 柳田泉《文学改良运动》，《国语和国文学》第378号，1955年10月。
- 26 樽本照雄《梁啓超の種本：雑誌『太陽』の場合》《清末小説から》第50号，1998年7月。
- 27 纲岛梁川《国民性と文学》《早稻田文学》第7年第8号1898年5月。
- 28 斎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p. 63。
- 29 木戸雄一《「国民」という読者と「小説革新」：高山樗牛の「国民文学論」をめぐって》《日本近代文学》56号1997年5月。
- 30 木戸雄一（同上注）认为，高山的“国民文学论”是以文学的自立（自律）为前提主张的“小说革新”。故此，笔者定义为“自律性”。
- 31 鈴木正節《博文館『太陽』の研究》アジア経済研究出版会1979年5月。
- 32 如第26册《清议报》（1899年9月）的“寄赠书目”上就有《太阳》及其临时增刊《新法令》与《明治十二杰》，又如《太阳》第5卷第2号至第6卷第15号的“寄赠书目”上有第1至第63册的《清议报》几乎全部收录。另外《太阳》第9卷第2号上还有第23号的《新民丛报》，“寄赠书目”并非每册每号都有，但可以断定《清议报》《新民丛报》与《太阳》为互赠刊物。关于梁启超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将另辟一稿详述。
- 33 岸上操《梁啓超氏の談片》《太阳》第5卷第21号，1899年9月20日。
- 34 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
- 35 柳田泉《政治小说研究》上卷，春秋社1967年8月，p. 46。
- 36 《支那开化小史》一书，上海广智书局有译本，但梁启超认为该译本“译笔颇劣”。另据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王韬、顾燮光等编《近代译书目》所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0月，p. 481）可知，上海广智书局的译本题为《中国文明小史》，并且还有东亚译书局所译的原题未改的译本《支那开化小史》。也就是说《支那开化小史》在当时有两种译本。可见田口卯吉的思想对国人的影响应该是较大的。
- 37 柳田泉《明治初期の文学思想》上卷，春秋社1965年3月，p. 333。
- 38 柳田泉《文学改良运动》。
- 39 吉田精一《近代文芸評論史》明治篇，1975年2月，p. 64-65。
- 40 《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7月。
- 41 柳田泉《文学改良运动》。
- 42 梁启超《劫灰梦传奇》《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 43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2号1902年12月。本稿所使用的《新小说》的版本为上海书店1980年的影印版。
- 44 増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岩波書店1967年7月，p. 152。

〔付記〕

本稿作成にあたり、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の中井政喜教授より数多くの貴重なコメントをいただいた。記して感謝の意を表したい。